

武汉抗洪,为啥要采购360吨一遇水就发胀的黄豆?

连日来,长江中下游防汛形势严峻,江堤告急,为了守住大堤,武汉市江夏区准备了360吨黄豆应对险情。

等等,抗灾为啥要用黄豆?这吨位也不像用来吃的啊。

其实,黄豆对抗洪抢险有奇效,洪水过境后还能填补歉收的农田,就连辣条,都与洪水中的黄豆有着不解之缘,没想到吧。

据武汉市江夏区融媒体中心报道,早在今年3月,江夏区就准备了60吨黄豆用于防汛,由于近来长江水位不断升高,他们又从周边地区采购了300吨的干黄豆。

这360吨黄豆,被分别存放于金口电排站和范湖粮库内,以便随时取用。

“黄豆遇水会变大,可以对漏水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江夏区粮油收储总公司负责人介绍道,7月9日接到通知后,公司就成立工作专班,从本地市场及外地市场抢购黄豆。

除了黄豆外,江夏区在前段时间还新增了1000立方米的砂

石备料,存放在居字号分段院内,用于处置长江干堤险情。

用砂石并不奇怪,但遇水发胀的黄豆到底在抗洪中起着什么作用呢?

这就要提到一个现象:管涌。

据《实用水文学词典》解释,“管涌”是在渗流作用下,土体细颗粒沿骨架颗粒形成的孔隙,水在土孔隙中的流速增大引起土的细颗粒被冲刷带走的现象,也称“翻沙鼓水”“泡泉”。涌水口径小者几厘米,大者几米,孔隙周围多形成隆起的沙环。

简单来说,管涌就是堤坝渗水严重时,土体里的细沙被流水冲出来,在外形成环状的沙包。

管涌出现的时间久了,大量的涌水翻沙会破坏堤防和水闸地基土壤骨架,引起建筑物塌陷,造成决堤、垮坝、倒闸等事故,也会造成溃口。

要对付这种险情,蓄水反压(俗称养水盆)是一种有用的办法,即通过抬高管涌区内的水位来减小堤内外的水头差,从而降

低渗透压力,水往低处流不往外溢,从而防止地基被掏空。

这时,黄豆就派上用场了。

由于黄豆吸水性强,把它丢进“养水盆”,豆子体积会增大,不仅可以抬高水位,还能填补砂砾空隙,且黄豆储备量很大,容易抢购调配,还能回收利用,泡胀后能作优质有机肥。

黄豆因此成了抗洪抢险中的补漏利器,更厉害的是,它还有补救灾后农田收成的作用。

据上游新闻7月13日报道,由于长江水位上涨内涝无法排出,江西九州洲镇的农田大量积水,农作物被淹,这一季收成并不乐观。

对于受损情况,江洲镇二分场洪支书表示,村里农作物主要以棉花、水稻、黄豆、玉米为主,根据土地情况一年可以种植3季。

农田被淹后,第二季水稻已无法种植,但可以视情况改种玉米和黄豆。如果安排得当,可以最大程度弥补因洪水造成的损失。

所以,洪灾过去后,黄豆也



能派上用场,帮助农民渡过艰难时期。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冷知识”:辣条也诞生于黄豆与洪水的“纠葛”中……

据人民网2019年报道,1998年,湖南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当时农产品损失严重,平江县酱干产业的主要原料黄豆出现了大幅度的产能下降,直接对酱干产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为了养家糊口,平江县农民被迫要寻找新的出路,在这样的情况下,平江县三市镇的邱平江、李猛能、钟庆元在探索中用面粉代替豆粉,改进生产工艺,采用单螺杆挤压机械加工,加入辣椒、花椒、孜然、糖、盐、植物油等佐料,创新发明了麻辣味的辣条,一代“零食之王”就这样诞生了。

想不到,小小的黄豆,与洪水竟有这么多故事。

三天五人,农信社原一二三把手均落马,山西金融系统地震

最近几则消息震动了山西金融界。

7月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发布消息,原中国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安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一天前,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19日发布消息,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政府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局长(主任)竟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再往前推,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18日发布消息称,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崔联会等3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他们分别是: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崔联会,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主任邢亮喜,山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专职副书记、副理事长王忠泽,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三天之内,5人落马,尤其牵涉农信社系统原一、二、三把手。有专家就此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监管与被监管者存在共同腐败利益链,这是典型的“猫鼠合围”。

同时免职同时被查

张安顺生于1959年,河南人,被查时已退休一年。他的履历非常“纯粹”,自1981年参加工作到退休,38年间一直在金融监管机构中工作。

他最初在人民银行河南省及地方分行,济南分行郑州金融监管办工作。2003年调入中国银监会河南监管局任党委委员、局长助理。曾在银监会系统的河南监管局、宁夏监管局、厦门监管局、山西监管局等任职。2015年11月,出任山西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正局级)。

后来机构改革,他也短暂任银保监会山西监管局筹备组成员。2018年调到河南监管局当巡视员,一年后满60岁退休。

与张安顺相同,竟晖也曾为山西金融监管机构一把手。

竟晖早年在人民银行山西分行、天津分行太原监管办,山西银监局等机构工作。2009年进入银

监会系统,任分局局长,后成为山西银监局办公室主任。2012年到山西省政府金融办工作,其间任金融办副主任、主任。

后来机构改革组建山西省金融监督管理局,加挂山西省金融办牌子。他顺理成章任山西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省政府金融办)党组书记、局长(主任),至今年6月被免。

资料显示,金融监管局职责重大,金融政策法规、金融稳定、银行改制重组、证券期货业改革、互联网金融,以及企业上市等方面的工作都在其职权范围内。

此番3人落马的山西农信社,恰恰就在张安顺和竟晖的直接监管之下。

值得关注的是,崔联会、邢亮喜、王忠泽等3人在今年6月同时被免,如今又同时被查。他们均在山西农信社工作多年。其中崔联会就任山西农信社一把手之前,还担任过山西省财政厅办公室主任、国资委副主任。

专家:这是典型的猫鼠合围

3天5人落马的背后,今年6月18日,山西省委召开了“金融改革工作会议”。会上提出“推进金融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化解风险打造一流农商行城商行。

官方报道还明确提到,“要稳定预期、精准拆弹”,“把风险防控与金融反腐结合起来,严肃查处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坚决把金融领域的‘蛀虫’挖出来、清理出去”。

话音落下不久,金融系统的“五只蛀虫”就被清理了出来。由于一、二、三把手同时被免同时被查,也使得山西农信社成为本次金融风暴的中心。

今年4月初,山西召开省委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提到“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化解风险、重构体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事实上早在2017年9月,山西省政府就召开了全省协调推进农村信用社改制化险工作会议。山西省时任主要领导明确表示,“坚决啃下农信社改制化险这块硬骨头”。

《金融时报》曾发文称,山西银监局和省联社共同作出了从2017

年至2019年化解处置高风险机构的三年规划。

北京大学教授曹和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农信社进行改革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它介于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之间,原本就是一个‘灰色地带’”,此外,“从央行到省级政府层面,再到地市和县一级,形成了监管真空地带。”

曹和平表示,在金融改革过程中,很多农信社拥有了金融牌照,成为了村镇银行。“金融牌照非常值钱,谁拥有批牌照的权力,谁就有了寻租空间”。

就山西农信系统窝案,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廉政法治中心主任魏昌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是典型的猫鼠合围”。

他认为,监管与被监管者存在共同腐败利益链,是“猫鼠合围”型腐败,“农信系统一、二、三把手落马,属于内部腐败关系”,这表明其内部结构失衡未能有效制约。

或涉金融大案

资料显示,截至2019年末,山西省农信社资产总额1.28万亿元,各项存款8359亿元,各项贷款5316亿元。

据财新此前报道,山西省农信系统爆发大案,高层特批公安部成立“4·16”专案组,包括4个工作组,17个小组,山西省农信社一、二、三把手等100余人被带走问话或留置调查。

今年6月,山西农信社人事震荡开始。当时,崔联会、邢亮喜、王忠泽等3人被免。很快,山西省审计厅厅长王亚临危受命,被调到农信社任党委书记。

7月20日,中国新闻周刊向山西农信社了解情况,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内部人员对此事讳莫如深。

在专家们看来,山西农信系统改革,完善金融制度是关键。曹和平认为,需要“完善地方金融办的管理职能,尽快出台全国金融办省、市金融办的管理通则细则和专责”。

魏昌东强调,要严格外部监管,防止出现利益共同体,在制度上下功夫。同时严格内部监管,建构严格的三角结构。

25省份公布经济半年报 14省份GDP增长由负转正

各省份经济半年报陆续出炉。截至7月21日,全国至少已有25个省区市发布了2020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其中,14个省份经济增长实现由负转正。广东GDP总量依然位居全国第一,不过第二名的江苏与之差距大幅缩小。

25省份经济半年报出炉

国家统计局7月16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4566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1.6%。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二季度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此后,各地经济半年报也陆续出炉。

截至7月21日,据中新网记者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湖南、安徽、湖北、北京、陕西、江西、重庆、云南、广西、贵州、内蒙古、天津、吉林、海南、宁夏、青海、山西、甘肃等25个省区市发布了上半年经济数据。

在疫情的冲击之下,各省份的经济版图有哪些微妙的变化?不妨从GDP总量和GDP增速两个维度来看一下。

广东GDP总量依然是第一

从GDP总量来看,广东、江苏、山东依然占据前三强。

广东上半年GDP为49234.20亿元,同比下降2.5%;江苏上半年GDP为46722.92亿元,同比增长0.9%;山东上半年GDP为33025.8亿元,同比下降0.2%。

虽然广东依然占据第一的宝座,但其经济上半年还是负增长,而第二名的江苏上半年经济率先实现由负转正。由此,江苏跟广东的GDP差距缩小了不少。

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江苏GDP跟广东的差距为3737亿元,而今年上半年这一差距缩小到了2511亿元,江苏一下子缩小了1200多亿元的差距。

为什么会这样?从产业增长可以找到答案。

上半年,广东和江苏的第一产

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都实现了正增长,而在第二产业方面,广东是同比下降6.2%,而江苏仅下降0.2%。同时,广东上半年进出口同比下降7.1%,而江苏仅同比下降2.8%。

可见,在全球疫情蔓延、外需不振的情况下,作为外贸大省的广东受影响更大,出口下降,使得广东省的制造业企业不能开足马力,经济增长被第二产业拖了后腿。

2019年广东GDP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大关,江苏省2019年GDP为99631.52亿元,距离10万亿大关也仅有一步之遥。如今站在年中,留给两个经济大省的问题就是:2020年的GDP能否超过10万亿元?

14个省份经济增长由负转正 从GDP增速来看,江苏、浙江、四川、福建、湖南、安徽、江西、重庆、云南、广西、贵州、宁夏、青海、甘肃这14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实现了由负转正。

在这25个省区市中,贵州和甘肃的上半年GDP增速为1.5%,为最高。

贵州统计局表示,贵州省由一季度下降1.9%转为上半年增长1.5%,是全国各省份中经济恢复较好的省份之一,增速保持全国前列。

此外,广东、海南、北京、内蒙古、天津、湖北这些省份的上半年GDP增速低于全国GDP增速。

其中,受疫情影响最大的湖北,上半年GDP同比下降19.3%。不过,其降幅较一季度收窄19.9个百分点。

当前,湖北的经济也呈现复苏态势,部分经济指标由负转正。工业生产月度增速由年初低点加速回升,5月规上工业增加值由负转正,6月稳固增长态势,连续两个月增长2%。先行指标表现向好,工业用电量转正增长0.3%,增速较3月加快27.0个百分点。货运量增长11.1%,同比加快6.6个百分点。